

奥斯维辛之后的启蒙重构

——重访阿多诺的文化批评观念*

朱兆斌**

【内容摘要】

作为“启蒙之子”，阿多诺不仅仅在重构批评方式，还在重构启蒙方式，即重构一种与康德相似却又不同于康德的启蒙方式。阿多诺试图从文化工业逻辑、极权主义场域、意识形态机制等多方面出发，重构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批评；与此同时，他试图推进一种超越先验批评与内在分析的内在批评，从而打通作品的内部空间（文本构造）与外部空间（社会历史）。与此文化批评观念相配合，阿多诺选择以论说文来实现其思想的有效表达。论说文的形式建构反映了阿多诺的思想方式，并呈现一种文体乌托邦。但是，他的新启蒙策略只有在新问题的检测中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定位与评判。

【关键词】

阿多诺；文化批评；奥斯维辛；新启蒙；论说文

2023年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诞辰120周年，在此时间节点上重访阿多诺的文化批评观念，不仅具有纪念意义，还具有警示意义。以往对阿多诺文化批评观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法西斯主义批判与现代性批判，这次重访将从作为“启蒙之子”的阿多诺出发，并在思想场域、观念理路、表达方式（文体选择）以及当代挑战的多重关联中进行深入探讨。

尽管阿多诺在诸多著作中对康德提出批判，但他们在启蒙问题上并非全然对立。^①与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

* 本文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18ZDA275）阶段性成果。

** 朱兆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德国现代思想史。

① Matthias Benzer, *The Sociology of Theodor Adorn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58.

中的观念相似，阿多诺也聚焦于现代人（大众）的“不成熟状态”（Unmündigkeit，或译“受监护状态”）。对康德而言，这是一种“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Verstand）的状态”^①。在阿多诺那里，“不成熟状态”与此相似，不过他更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思想的整合，这种整合使大众不加批判地认可权威，并且把交换社会的欺骗信以为真。因此，他与康德一道，致力于推进现代人的“成熟状态”（Mündigkeit）。这一状态意味着现代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盲目的依赖与服从。

作为“启蒙之子”的阿多诺不吝于表达对不成熟状态的批判以及对走向成熟的期待，其中内蕴一种新启蒙的冲动。例如，他说：“为自己代言的人，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而不纯粹地重复他人。”^②他还曾尖锐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隐秘地向所有受其支配的人展示了一种耻辱性的选择：要么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人，要么就继续做一个孩子。”^③阿多诺对于不成熟或成熟状态的观察，均以社会为思考的基点。正是从此出发，他明确地强调：“个体的衰落不能由个体本身来推断，而只能通过其社会倾向来推断。社会倾向既是个体的对手，又是个体表现的形式。”^④出于对“走向成熟”的推进，阿多诺倡导一种“批判教育”^⑤。他的文化批评及其观念，便可被视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批判教育，而这正处于广义的现代启蒙（区别于狭义的“启蒙辩证法”）的延长线上。

一、战后德国思想场域中的遗忘与任务

阿多诺在奥斯维辛之后格外关注重塑大众意识的问题，这与重构文化批评观念紧密相关。它们共同内在于阿多诺在战后德国思想场域中的“新启蒙”，毋宁

① [德] 康德：《康德历史哲学文集》，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②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lated by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1.

③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133.

④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148.

⑤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20.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331.

说，这是对启蒙的一种重塑。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1949）中直接提出“奥斯维辛之后”（nach Auschwitz）的文化批评观念。这篇文章写于阿多诺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涯而重返德国时期，文中的讨论对象主要针对德国，因而这篇文章可被视为阿多诺在战后归国之际重新进入德国问题的一个入口。在阿多诺研究专家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sen）看来，这篇文章就是阿多诺进入“后纳粹德国”（post-Nazi Germany）的一张入场券。^① 它表达出阿多诺在批判大众之后的策略，即以正确的文化批评来引领大众的认知，从而实现“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历史—文化诉求。不过，要理解这篇文章，就必须了解战后德国的思想场域。

战后德国的思想文化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充分自觉地朝向积极的方面发展，相反，历史罪责的追问失却于集体性沉默，去政治化的潮流逐渐涤荡社会各界，反犹太主义的冲动隐蔽于日常事务。对阿多诺来说，这一境况极其危险，必须以重构文化批评观念的方式推进对大众的启蒙，因为战后德国社会严重缺乏反思意识，而只有批判性的反思意识才能在此后抵御历史悲剧的再现。

概而言之，战后德国在文化领域需要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进行历史反思的问题，其二是如何进行文化重建的问题——这是阿多诺启蒙大众的两个内在环节。前者是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其之所以对文化领域同样重要，原因在于文化重建必须在历史反思之后进行。然而，历史反思却遭遇到了最大的对手，即有意或无意的遗忘。阿多诺曾在1965年以“形而上学”为题进行的演讲中谈及一种类似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恶：“平凡（triviality）是罪恶的，具体而言，它是一种使自己适应于如其所是的世界并遵循惰性原则的意识和精神的形式，这种惰性原则正是最为邪恶的。”^② 就此而论，惰于历史反思就是一种惰性之恶。阿伦特也曾把“遗忘”归于“平庸之恶”：“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

^① Detlev Claussen, *Theodor W. Adorno: One Last Geniu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61.

^② Theodor W. Adorno, *Metaphysics: Concepts and Problems*,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 2000, p. 115.

去的事就意味着在过去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①这段话与阿多诺的看法基本一致。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记载，在“二战”后的德国，很少有人谈论纳粹分子；譬如，学校中缺乏相关的教育，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对纳粹的附庸行为从未被人提起，甚至在政坛上那些具有纳粹背景的人也没有得到重视以及处理。^②其他国家与此相似，譬如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曾提及美国的状况：“大屠杀在‘二战’结束后的前二十年左右几乎不被提及。”^③对于这种战后的思想状况，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有较为生动的描述。他曾指出，在战后最初三年里，少数德国人尚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纳粹时代，然而，到了1948年（即阿多诺写《文化批评与社会》的前一年），一个新的神话开始诞生：“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发生。”^④

我们很难辨析德国民众的遗忘哪些是有意的，哪些是无意的。但是，遗忘历史的客观效果是切断对历史的反思。固然，一些人宣称，人们必须遗忘，因为不能遗忘的人怎么继续生活呢？尼采很早便指出过这种遗忘的逻辑：“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⑤对他们而言，尼采这句话说出了人的生活与历史的一种隐性关系：“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⑥然而，当德国人普遍地与不堪记忆的历史划清界限时，不仅历史反思难以进行，文化重建也将面临严峻的问题。

当战后德国思想文化领域仍然沉浸于“文化德国”的幻想以及真、善、美的价值理想，阿多诺则尖锐地指出忘记历史、缺乏反思的危害性。1952年，他在《论文学批评的危机》（*Zur Krisis der Literaturkritik*）中将矛头直指战后德国文坛，认为纳粹主义拆毁了作为文化地基的自由批判精神，而这种拆毁在战后仍然

① [美]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②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89, p. 13.

③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p. 1.

④ [美]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122页。

⑤ [德]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⑥ [德]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发挥着影响。如果说战前德国的文学批评仍然具有自由而独立的批判精神，并且在诸如《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那些获得批判的阵地，那么随着纳粹对这些批判阵地的扫荡，批判精神便丧失了自由挥洒的公共平台。受此影响，战后德国文坛中的“文学批评”（Literaturkritik）实为“艺术观赏”（Kunstabstrachtung）^①，自由的批判变成了自由的赏玩，而这实际上展现了对社会的顺从，并参与形塑着肯定性的文化氛围。

在阿多诺看来，战后德国文坛无法与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并且时常受制于僵化的秩序与体制，从而难以激活独立的批评精神。用他的话说，在当前的德国，“反讽、思想的灵活性以及对既定秩序的怀疑主义从来没有得到重视”^②。与此同时，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使文学批评趋于套路化，而学科化的文学领域又使文学批评局限于表达形式。阿多诺认为，这种貌似中立化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因为它似乎确信存在一种独立于或外在于政治的文化观念，而这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确信却无形之中成为既定秩序与体制的同谋。与此相对，如果要成为独立的批评家，“就只能同时投身于完全的自由与责任，投身于正面相向的客体，毫不顾忌大众在接受与权力的格局”^③。这不仅是在“后奥斯维辛时代”重塑文学/文化批评的前提，还是在此时代重新激活思想文化领域的必要之举。

阿多诺在1959年的一次以“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Was bedeutet: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为题的广播演讲中直接提出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在他看来，必须重新唤起历史记忆，抵御对过去的无意遗忘与有意抹除。他强调：“家长必须要倾听孩子们提出的关于希特勒的尴尬问题，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洗刷罪责——谈一些当时存在的好的方面，说什么那个时代实际上并非那么糟糕。”^④

①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6.

②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6.

③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2,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8.

④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lated by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0.

他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遗忘状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从当下走进过去”^①，重建历史的坐标，并对其给予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同样如尼采所说：“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②

在阿多诺这里，历史反思与文化重建内在相关，它们合力才能促进对大众的新启蒙。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便曾质疑：“有这么一种愚蠢的观点：战争结束之后，生活将‘正常’继续，甚至文化也可能被‘重建’——就像文化重建还没被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已遭谋杀，这被视为一场插曲，而非大灾难本身。这种文化还有什么好等的呢？”^③阿多诺否定了文化重建，因为纳粹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已经证明了先前文化的失败，将已然失败的文化重建起来，不仅无异于对历史的遗忘，还可能重新召唤出极权主义的幽灵。

二、重塑大众意识：重构文化批评观念

阿多诺把《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收入文集《棱镜》（1955），并将其作为纲领性文章而置于文集之首。与《启蒙辩证法》中的讨论相似，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进一步指出了文化被纳入拜物教的逻辑。他指出，那些文化批评家以及“文化工业”都将文化视为崇拜的对象，然而，这背后却是文化的中立化与物化。在商业逻辑驱动的文化秩序中，文化以及文化批评都不再有自律性，仅剩下文化拜物教中的盲目崇拜，而这正是在总体化社会中运行肯定性逻辑的他律性。宣称自由的市场（自由市场）以强大的商业逻辑将文化以及文化批评家固定其中，这显示出总体化社会中根本的不自由。文化批评家与作为其批评对象的文化状况都存在盲目性，因而都难以从既定秩序中解脱出来，否定性的自律姿态也无从谈起。

①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lated by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0.

②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③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55.

相较于文化与商业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相互勾结，阿多诺直接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置于法西斯主义形塑的极权场域之中。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文化以及文化批评都服从于特定的总体性秩序，不仅丧失了自由、独立以及自律性，还深深卷入既定秩序的内部逻辑并参与强化这一逻辑。这包含了一个文化被官方收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文化的商品化一致，共同呈现了文化的物化。因此，阿多诺指出，文化已经退化为意识形态，即文化已经成为“虚假意识”。然而，文化批评家赖以生存的就是这种物化的文化。

若文化脱离了物质生产领域，随着商业与政治的收编，文化便成了意识形态的幻象。然而，文化批评家并未对此有所察觉，相反，如阿多诺判断的那样，文化批评家与文化形成了一种同谋关系。具体而言，在商业的收编中，文化批评家扮演着信息收集、价值评估乃至市场导购的角色；而在政治的收编中，文化批评家则成了既定秩序或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他们只会导引大众服从于既定秩序与现存体制。在阿多诺看来，文化与文化批评家都倾向于摆脱否定性，而将肯定性确认为自己一以贯之的逻辑，由此走向了物化的道路。因此，重新赋予文化批评以否定性与辩证性便是当务之急——否定性是对肯定性的克服，而辩证性则与物化毫不妥协。按照他的说法：“批评的任务并非探寻那些被分配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文化现象，而是破译那些文化现象所表达的、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由此实现自身的一般社会趋势。”^① 由此，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的落脚点不是文化重建，而是文化批评的重构。

阿多诺坚持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过时，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屈服于其所批判的对象。用他的话说：“通过把因果概念直接从物理世界移植到社会之中，因而也使自己屈从于其所批判的主题——物化，它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对象。”^② 这一判断根植于阿多诺对彻底物化的现实世界的理解，似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虚无。这是一个总体化程度极高的社会，按照阿多诺的观点，总体化程度越高，精神的物化程度也越高，因而依靠其自身来逃离物化社会的尝试也越自相矛盾。基于此，阿多诺首次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

①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1.

②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3.

的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① 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必须以理解阿多诺对总体化社会的判断为前提：只有将总体化极高的社会图景纳入思考，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写诗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写诗属于精神活动，然而，“绝对的物化曾把精神的进步作为自身的前提要素之一，但如今却有彻底吸收精神的架势”^②。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绝对物化的体现，当绝对物化把精神纳入自身的总体化逻辑，那么写诗也将与其他精神活动一道陷入物化与总体化。作为服从总体化的物化活动，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当然是野蛮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喻指人类以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来使自身毁灭，而在哲学上，阿多诺则将其视为人类几千年来追求同一性原则的现实结果。从中世纪对有罪者的杀戮，到20世纪纳粹大屠杀，这种同一性无视现实之中个体的具体生存，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逼向死亡。正是由此，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确证了纯粹同一性就是死亡这个哲学原理。”^③ 尤其当我们具体到种族大屠杀之时，这种同一性原则将会更加明显。为了实现种族的高贵的同一性，大量非同一性的存在者都要被清除。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指认，因为同一性正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同时，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死亡还表明：“趋向形而上学的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摧毁了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经验一致性的基础。”^④ 人失去了那种在过去形而上学思辨中使人超拔于自然之上的力量。

不过，阿多诺还开放了一种希望，即对尚未消亡的批判精神的希望。他以此来结束对现代世界的悲观讨论：“如果批判的精神还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冥想 (self-satisfied contemplation)，那么就无力应对这种挑战。”^⑤ 那么，批判的精神究竟如何在文化批评领域中应对危机时代的挑战呢？或者说，文化批评如何在“奥斯维辛之后”进行重构呢？

阿多诺明确地将贯彻批判精神而保有独立性（自律性）的批评称为“内在批评” (immanente Kritik/immanent criticism，或译“内在批判”)。在他看来，意

①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4.

②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4.

③ [德]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13页。

④ [德]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13页。

⑤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4.

识形态自身并非虚假的，它只是与现实相符合的伪装。他指出：“对精神和艺术现象的内在批评，就是通过分析它们的形式与意义，以把握它们的客观理念与其伪装的矛盾，并且指出作品自身中的一致性或非一致性对于存在的结构表达了何种内容。”^①就此而言，“内在批评”并不止于认识到各种现象的奴性，而是致力于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对事物本身的更高认识。

对阿多诺而言，相较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内在批评才是更为真实的还原，因为它是一种打破假象的追踪。如果说现象学还原试图通达一个纯粹意识的领域，那么内在批评则试图追踪纯粹者的前提，从而将纯粹领域还原到社会领域。在内在批评的还原中，包括绝对第一者在内的任何设定都可被还原，因为它们被辩证法确认为必然被中介的事物。由此可见，西方认识论传统构建的等级结构是虚假的。

与形而上学—认识论领域一致，具体到文化—艺术领域，“内在批评”同样是阿多诺始终秉承并着力构建的批评方式。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内嵌于作品结构之中，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作家或读者的主观设定。他反对两种批评方式：其一是从既定的思想观念出发来进入艺术作品，如康德与黑格尔的观念论批评，再如马克思主义的介入理论家倡导的“意识形态批评”，阿多诺曾将这种批评称为“先验批评”（transcendental criticism）；其二是直接进入艺术作品之中，分析其中的组织结构与形式技巧，阿多诺将这种批评称为“内在分析”（inner analysis）。然而，这两种批评方式均具缺陷：前者忽视了艺术作品的形式特色与审美成就，后者则止步于形式层面的表层元素与具体细节。至于依据“净化”“移情”“趣味”“天才”“升华”等概念进行的批评则更加不堪，因为这种方式将客观的艺术作品视为主观个人的心理感受或偶然创造，忽视了艺术形式的客观性意义。因此，本雅明在《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中较早强调“内在批评”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标识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还强调批评应当把艺术作品视为一个自律而独立的整体，而不能以外在的标准强加其身，即不能把艺术作品当作他律的工具。阿多诺后来将“内在批评”发展为一个与“超验

^①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32.

批评”相对立的概念。所谓“超验批评”，包含着传统马克思主义以一种高于社会历史的理想观念作为标准的批评。阿多诺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批评必须是一种“内在批评”，而不是首先从理念式的唯心主义出发的“超验批评”。“内在性”存在于各种独立而各异的形式之中，“内在批评”就是在具体的形式之中把握自律的内在性与他律的外在性（如外在伪饰、物化压抑）之间的矛盾。按照阿多诺的看法，“内在批评”从艺术作品的客观形式出发，在审美形式的客观建构之中分析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与意识形态内涵，揭示其中的同一与差异、连续与断裂，由此启动艺术的认识价值。“内在批评”综合了“先验批评”与“内在分析”，打通了作品的内部空间（文本构造）与外部空间（社会历史），因而是一种“辩证批评”（dialectic criticism）。

对阿多诺而言，“内在批评”是批评自身进行自我批判之后的结果，而批评如果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自律性，就必须持续进行自我批判。在总体化的社会中，“内在批评”没有遵循肯定性逻辑，而始终保有否定性内核。正如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所强调的，否定性不仅是文化保持其真理性的基本要素，还是文化批评在总体化社会中的主要价值。事实上，阿多诺正是借由否定性的内在批评来施行一种独特的启蒙。如他所言：“文化批评家没有看到：生活的物化不是因为启蒙过多，而是因为启蒙太少；他们看不到当前特殊的理性对人的肢解，而这正是总体的非理性状况的标志。”^①就此而言，阿多诺不仅仅在重构批评方式，还在重构启蒙方式，即重构一种与康德相似却又不同于康德的启蒙方式。

三、文体乌托邦：文化批评的文体选择

阿多诺不仅重视批评方法问题，还特别关注批评文体的选择。他的“内在批评”是其批判理论建构的关键环节，而批评文体则直接与批判理论如何表达相关。不仅如此，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内蕴一种哲学方法论批判，并致力于重构后形

^①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 24.

而上学时代的理论方法。就此而言，阿多诺的文化批评重构并不仅仅属于文化领域，它还有着潜在的形而上学批判背景。出于思想的内在要求，阿多诺在表达之维具有自觉的追求，换言之，他致力于使文体与其思想诉求相符合。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中，人们不仅面对着传统形而上学瓦解以及“世界祛魅”的思想局势，还面对着世界范围内普遍理性化、工业化与技术化的生存现实。作为一种应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既不能再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神学体系，又不能服从于现代社会的同一性秩序。因此，后形而上学的思想不仅要在内容层面具有批判性与独立性，又要在表达层面展现出一种区别于传统思想表达模式的新特征。就此而言，表达层面的探索绝非仅仅具有形式层面的意义，它不仅是思想内容得到有效表达（不损害其内容）的前提，还作为思想的表征而内在于思想的肌理之中。

阿多诺的独特文风正是其特殊的追求所致。他曾写道：“作者被敦促要明晰地展示使他得出结论的所有步骤，这样每个读者都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学术行业中——复制这个过程。这一要求不仅激发了认为每一种思想都具有普遍可交流性的自由幻想，而且还由此抑制了它们客观上恰当的表达，而且这作为一种表达原则本身也是错误的。”^①这段话展现了阿多诺在文章写作方面的特殊诉求，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他对思想及其表达的独特认识。在他看来，人们惯常而言对于写作中明晰性的要求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幻想，即认为每一种思想都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的可交流性。这种明晰性的诉求能够使思想顺利进入学术行业，并在学术场域中不断得到复制意义上的再生产。阿多诺不仅对此嗤之以鼻，还认为明晰性的诉求会极大地损害思想的恰当表达，而这相当于对思想的破坏。他的基本看法是，如果思想要保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就必须与现存的熟悉事物以及先已存在的标准保持距离；这一距离不仅使思想保持独立，还使思想与既定秩序保持对立关系，从而避免受到既定秩序的整合与收编，从而区别于屈从平庸以及单调的一般思想。

阿多诺的要求非常之高，甚至齐美尔也被他视为反面教材。他紧随上述陈

^①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80.

述，写道：“齐美尔的作品都因其与众不同的主题与吃力的清晰处理之间的不相容而受到损害。”^① 对阿多诺而言，这里并不涉及在思想表达层面深入浅出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如何为思想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依他之见，如要保持思想的独立地位与对立功能（对他而言，这便是思想的价值），就必须选择与思想自身相合的恰当的表达方式。对此，他不仅在言辞层面选择了一种疏离于大众读者的语言（因而艰深难读），还在体式层面采取了一种挣脱同一性限制而彰显独立与自由的文体，即“论说文”（Essay）。

阿多诺曾于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以“哲学的现实性”（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为题的就职演说中直接提出：“我将历史不变性、本体论基础部分原本应有的历史力量，给予历史事实或者对它的整理，驱逐与历史上产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偶像崇拜’（Götzendienst），使哲学围绕着那个不变的标准，使之溜进审美游戏中，并将‘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转化成哲学的‘论说文主义’（Essayismus）。”^② 这不仅展现了阿多诺在论说文中寄寓的思想诉求，还突显了批评文体在他思想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不久之后，阿多诺在1932年康德学会法兰克福分会的集会上以“自然历史的观念”（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 1932）为题发表演讲，他再次提到：“在进入正题之前，我首先申明，我的演讲既不会给出什么结果，也不提供什么系统的阐述。相反，我必须指出，它将依然保持在论说文层面上。”^③ 这再次表明论说文绝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批评文体，它还辩证地与阿多诺的思想内容直接相关，并且直接决定了思想如何表达。

阿多诺对文体的探索十分自觉，他曾在《作为形式的论说文》（*Der Essay als Form*, 1958）中试图专门将这种追求予以主题化阐明，并将论说文视为最理想的批评文体。对他而言，非同一性的思维需要适合的文体进行表达；用同一性的学院论文来表达非同一性的哲学诉求，这本身只能造成一种悖反。较之学院论文，论说文避免了表达层面的总体性与压抑性，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理论张力与思想

①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80.

②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S. 343. 译文参考了王凤才译本（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③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S. 345. 译文参考了张亮译本（参见张一兵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火花。阿多诺指出：“论说文绝不使自己的领地被权威规定。论说文不是科学地完成某物或艺术地创造某物，而是努力反映一个孩童般的人的快乐，这样的人毫无顾虑地谈论他从其他人做过的事中获得的灵感。”^①换言之，论说文自身就是确保在文本内部自由表达的权威，它不给任何有可能出现在文本中的元素造成任何障碍，而仅仅抵御某种同一性思维对文体的侵害。

论说文的形式建构反映了阿多诺的思想方式，即其原则不源于某个第一原理，也不在自身的逻辑中确立同一性机制。论说文的建构方式是非连续性的，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中止：“它在片断中思考，就像现实处于片断化之中，在碎片之物中并通过碎片之物来寻找它的整体，而非通过遮盖破碎之物来实现这一点。”^②论说文的文体特征取决于其自身的对象整体以及已经进入其对象范围的理论经验的整体，它绝不允许主体用某种主观设定的大网来捕捉客体存在。阿多诺试图通过论说文来呈现客观经验与思想世界的“星丛”——在论说文中，思想的深度在于如何深入地穿透对象，而非将对象还原为其他某种东西的程度；思想的发展方向绝不单一，而如地毯的纹理一样错综复杂，从而具有高度的多产性。在此，阿多诺俨然是于论说文之中构建一个“文本乌托邦”（utopia of text）。论说文将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冲动纳入文本的展开之中，其反总体、反压抑、非同一、非连续的表达诉求及其繁复、辩证而片断化的文本呈现，都彰显一种激进的文体学。与此同时，这种文体追求也造成阿多诺文风的繁复、晦涩以及所谓不可译性。

如对思想自律性与艺术自律性所坚持的那样，阿多诺也坚持文体的自律性，拒绝一味向“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妥协而丧失理论自身的本然样态。在他看来，对可交流性的妥协意味着对大众的顺从，这不仅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加剧着大众思想的贫弱。由此可见，从缘起到写作过程，再到效果，论说文都传达出阿多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以及对思想路径的选择。

尽管早期卢卡奇也强调论说文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像阿多诺那样在地位确认

①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4.

②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 1, translated by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

与写作实践中充分调动论说文的潜能。如理查德·沃林所说：“对早期卢卡奇来说，论说文表示一个过渡性的形式。对于各种更加完备的知识，注定要转变成总体性（totality）的知识来说，它仅仅是一个代理者或先行者。”^①然而，对阿多诺而言，论说文始终具有一种对抗性意义，并以形式层面的否定性精神与总体性针锋相对。因此，战后的新启蒙有必要采用论说文的表达方式。

余论 新参照：审美资本主义的现实挑战

然而，无论是重构文化批评观念的诉求，还是选择文化批评文体的目的，均须在现实趋势中接受考察，甚或要面临现实趋势的挑战。如果说把阿多诺对文化批评观念的重构置于战后德国思想场域之中来理解是一种必要的“向后看”，那么从现实趋势中的新问题出发来重新审视阿多诺的文化理论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向前看”。尽管区别于海德格尔，阿多诺试图更为现实地审视大众社会的兴起并自觉地筹划应对之策，但他的新启蒙策略只有在新问题的检测中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定位与评判。

在现实趋势中，审美资本主义（aesthetic capitalism）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这不仅因为它已经在当代文化场域的中心地带成为新问题，还因为它处于阿多诺文化理论关涉对象的延长线上。法国学者阿苏利（Olivier Assouly）对审美资本主义的分析较为充分，他主要是在经济审美化所框定的市场合理性与审美无功利性的对立性架构中展开思路的。他并没有着力讨论审美资本主义内蕴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而是通过对审美资本主义之运作方式的讨论来探索经济与审美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引入阿苏利的考察，我们可以形成定位阿多诺文化批评观念的参照点。

当代审美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标识着时代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特色，从阿苏利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将其运作方式概括出以下特点：

其一，经济普遍从艺术领域获得灵感，并调整着自身的逻辑。如阿苏利所

^① [美] 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说：“这一运动演示了从外向型经济到内向型经济的演变过程，外向型经济以消费品的销售市场从国内到国外的扩张为基础，内向型经济则以依靠人工制造的审美消费品来革新市场为目的。”^①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者试图越来越细地划分国内市场，使需求变得多元化，以此来代替国外市场。不过，这种经济的审美化还不仅在于重塑市场，还在于制造个人的感知。艺术领域始终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比如通常而言，一个人走进画廊，并不是为了发现或寻求某一特定的画作，而是渴望看到不确定的一些画作。在审美资本主义中，这种不确定性也被纳入经济领域，如人们往往会在不知道买什么特定商品的情况下进入商店。在此，经济的审美化呈现出更多的趣味，并且自我要求要呈现给顾客更多的惊喜，亦即一种不确定性的偶然因素。

其二，以消费者为设计的中心，在根据市场而持续进行审美更新的同时，利用统计学的测量方案来归纳“中庸品味”从而满足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的憧憬。福特（Henry Ford）在20世纪初期在美国推出的汽车，被视为功用性工业消费动机向审美化过渡的例证。福特没有着意建立满足个人审美品味的生产模式，而以功用性为至上，并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但在1920年之后，福特连续二十年成功地生产同一款汽车而垄断市场的状况被打破。其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更倾向于满足消费者的审美品味，每年进行汽车的审美更新，从而打破了福特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显示出，审美更新已然成为市场的兴奋剂。基于规模化生产与消费的考虑，企业必须创造显示着审美品味的“风格”。在维持个人的审美憧憬与想象的同时，风格超越着个人的独特性。通过统计学的测量方案，“中庸品味”便被归纳了出来，风格便得以据此而创造。阿苏利指出：“中庸品味意味着不出格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感觉，符合可预测的、平衡合理的社会规划。”^②因此，以“中庸品味”呈现的审美品味不再是独特性的边缘化表达，而是全民品味的一种合理化平均值。

其三，兼重欲望的评估与制造，专家的介入与市场营销的变革产生重要作

① [法]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79页。

② [法]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用。审美品味不仅增加着消费，还从心理角度为生产者把握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提供着依据。在审美资本主义中，审美关系是一种商业关系，是一种被商业开发并促进经济活动展开的动力。对生产者而言，这意味着将难以计算的顾客需求转化为可以预见的基于审美品味之上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广告、专家分析、市场营销等也深刻地参与其中。生产者必须倾听市场的声音，测量着社会需求，分析着审美品味，捕获着消费者的喜好与欲望，并通过将其转化为可靠的数据，来有效地通过各种手段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与评估消费者欲望的同时，专家分析与市场营销也创造着消费者的欲望。如果说评估欲望是通过对消费者的认识而建立一种生产与营销指南的话，那么创造欲望则是通过进一步挖掘并调动消费者的欲望而展现出更多的生产与营销的可能性。

阿多诺的文化批评观念显然无法预见到以上审美资本主义的现实挑战，因而也难以成为审美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理论工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代审美资本主义批判中看到阿多诺的理论因素。在阿苏利看来，审美资本主义中的冲突在于审美无功利性与市场合理性之间的对抗。在康德以降的美学观念中，审美在本质上的自主性被作为一般性知识接受下来。阿苏利也承认此观点，认为自主性的无功利性审美有着冲破外在化束缚的潜力，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审美化对审美本身带来了一些危害：生产者将审美品味视为一种可被测量、审查与认可的存在，并将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标准化与程式化，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审美愉悦感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更不适合被商业化的审查或认可，这也符合阿多诺的看法。

此外，经济审美化的依据实际上是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意义上的“群众”（the crowd），他们往往具有冲动、盲目、轻率的特点，因而是武断的。这实际上是说，经济审美化在审美欣赏上有着强烈的武断倾向。因此，经济审美化在将不可估量的审美感受性转化为理性的经济活动动力之时，实际上损害着审美感受力。在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工业生产体系的商业性与标准化和审美的自主性与个性化之间的冲突似乎始终悬而未决。在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阿多诺文化理论的生命力。

不过，阿苏利也在探寻着应对上述冲突的策略，并在此与阿多诺的文化批评

观念拉开距离。阿苏利深受塔尔德对“公众”(the public)与“群众”的区分的启发：“群众”大体是由实在的接触而产生的具有多种心理联系的人群，而“公众”则是一种精神性的集体，即虽然并无实在接触但却精神联系的集合：人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意愿、信念或热情。阿苏利认为，经济审美化的依据是那些冲动、盲目而轻率的“群众”，这无疑加深着审美资本主义的缺陷。因此，他指出：从审美群众向审美公众的过渡变得十分迫切，因为“公众”能够避免“群众”的缺陷。在这里，阿苏利已经尝试跳出阿多诺式文化理论对受众的轻视。

问题的关键是：阿苏利细致分析的审美资本主义呈现了文化与经济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态势，这种互动及其联合将不断带来新问题，且超出阿多诺所见之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不仅要把阿多诺对文化批评观念的重构置于战后德国思想场域之中来理解，并且视为一种在奥斯维辛之后面对德国思想场域中的遗忘与任务的回应，还要充分考虑到当代文化经济领域中持续不断的新变，尤其是审美资本主义的现实挑战，因为这将决定阿多诺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阿多诺在文化理论层面的新启蒙对当前的文化考察有着颇多启发（如对经济以及资本力量的警惕与批判），但也存在缺陷（如轻视受众维度的主动性，且没有触及文化与经济之间更为复杂的方面）。因此，我们对阿多诺的文化理论也势必要采取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借鉴其批判的锋芒，其二是补充其观察的不足。

(特约编辑：周锋)

Re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after Auschwitz —Revisiting Theodor W. Adorno’s Concept of Cultural Critique

Zhaobin ZHU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son of enlightenment”, Theodor W. Adorno not only reconstructs critical methods, but also reconstructs the way of enlightenment, that is, to reconstruct a similar but different way of enlightenment from Kant. Adorno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critique after Auschwitz from the logic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field of totalitarianism, the ideological mechanism and other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he tried to promote an immanent criticism beyond transcendental criticism and internal analysis, so as to open up the internal space (text structure) and external space (social history) of the works.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ritique, Adorno chose to use argumentative writing to effectively express his ideas. The formal 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ve writing reflects Adorno’s way of thinking and presents a literary utopia. However, his new enlightenment strategy could only be more comprehensively positioned and evaluated in the detection of new problems.

Keywords: Theodor W. Adorno; cultural critique; Auschwitz; new enlightenment; essay

Haraway’s “Cyborg Writing”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

Guodong LI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Haraway appropriated “Cyborg” as a metaphorical concept, created the paradigm of “Cyborg writing”, and attacked the right-wing political thought represented b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Cyborg Manifesto* criticized the western dualism ideology, deconstructed three typical dualistic boundary division, and touched the deep root of western political inequality. Thus, the “women” category constructed by dualism is also deconstructed, and women in endless differences are regarded as Cyborgs. Women today are in a similar environment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so the Cyborg can be imagined as a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 the potential for unity and revolution. However, due to its emphasis on language rebellion, creation of mythological charm, confusion of conceptual signification and West-centralism, Haraway’s theory has obvious limitations that lack of declarativ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promise of post-colonial deconstruction has not been fulfilled

Key words: Haraway; Cyborg; ideology; dualism; feminism